

唐代论说体讽谕文考察*

—以讽谕与论说文体式变化之间的关系为主—

南哲镇** · 崔桓*** · 禹在镐****

<目 次>

I. 序 论	2. 说体讽谕文
II. 本 论	III. 结 论
1. 论体讽谕文	

I. 序 论

论说文是一种以议论和说明为表现方式的文体. 前人根据议论的方式和侧重点, 把论说文划分成论, 辩, 说, 议, 原, 解(释)等体式. 基于此, 严格地说, 论和说都是文体的一种. 不过论证事理, 阐明主张的文体一般被统称论说文. 所以谢楚发先生说论辩文, 议论文都是论说文的异名¹⁾ 那么论说文和讽谕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讽谕是以比喻的方法来对社会, 政治, 人生等现实问题进行讽刺劝说, 告戒, 从而使现实状况得以改善的一种手法. 讽谕文本身是论说性或议论性较强的文章, 特别是中国的古代论说文, 一般都很注重表达自己的理想, 抱负或者某种政治学术观点. 因此, 陈必祥先生在《古代散文文体概论》上设立

* 이 논문은 2005학년도 영남대학교 인문학육성기금(협동연구회) 연구장려금 지원에 의한 것임.

** 영남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전임강사

*** 영남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교수

**** 영남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부교수

1) 谢楚发, 《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第87页.

讽谕文，并把它附列于论辩文之后。之所以如此归类是因为讽谕文有叙事成分但总体上以议论为主。²⁾ 讽谕文可以说是借用叙事的方式进行议论的独特文章。所以，唐代很多文人借论说体式来写成讽谕文。

唐代的古文运动开创了我国古典散文的一个新时代，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高峰。古文家创造的新型古文是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散文。而古文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就社会上的改革斗争在文学的反应。³⁾ 由此可知，古文运动的根本目的与以讽刺教导为目的的讽谕之间有相通之处。因此，唐代特别安史之乱之后，很多古文家开始写作讽谕文。不过当时文人对讽谕文没有文体的认识，只是借已有的文体来写出讽谕文，而讽谕文又有自己固有的特点。所以如果要写作讽谕文，则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当时文体的基本体式。因此，通过考察唐代论说体讽谕文的特点，我们可得知当时论说文文体改革的具体的一面。这一点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至今对古文运动和文体改革方面的研究已不少，可是对各个文体变化的具体原因和变化原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因此，本论文主要考察唐代讽谕文创作与论说文体的变化之间的关系。

II. 本论

1. 论体讽谕文

论体文是古代论说类中最基本的一种，而且使用最广，作品也最多。那么，什么叫“论”？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里说：“圣哲彝训曰经，说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不爽，则圣意不堕。”，“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⁴⁾ 从这里，我们可窥见儒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不过，大体上刘勰对论的解

2) 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第34页。

3) 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第351-353页。

4)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326-327页。

释是妥当的。其意思是通过综合研究各学派的言论，探讨出一个既正确又深刻的道理，道理陈述时该有次序和条理，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精一理”。为此，该有次序和条理才能对某个论点又彻底又集中地探讨。谢楚发先生对刘勰的这段话大体上同意，而他指点刘勰漏掉了重要的一点。他认为论说文必须是从正面阐述事理，表明己见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立论文。这正是论说文的体式特点。

论的渊源很早，前人对此曾经提到过。比如，《文心雕龙·宗经》里说“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⁵⁾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里说“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⁶⁾ 主要是因为《易》里往往通过明确的观点来说明卦辞和爻辞的意味，可以说它具备了论说文体的最基本的要求。战国时期，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论辩性文字大量出现并确定了论说文的一些最基本的形式。因后世的论说文无不受诸子的影响。故姚鼐《古文辞类纂》中说：“论辩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⁷⁾ 到了西汉，出现了以论来提名的独立短篇论，如贾谊的《过秦论》，不过《过秦论》的体裁是和奏议类相似。在汉初论因受到前一代的影响而游说的性质较强。而东汉以后，论文的风格开始有了变化。凡论名篇的作品，游说，劝说的味道已逐渐殆尽。在内容方面，每个时期的论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社会的情况。彭玉平先生按时间，内容特点把汉魏六朝时期之论文分为“两汉时期依经立论”，“魏和西晋张皇老庄”，“东晋南朝竞辩佛理”等⁸⁾

到了唐代，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论体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论说文在古文运动中，实际上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因为这次运动是以恢复儒学的正宗地位而号召起来的，所以除了文章的语言，形式外，内容方面，就不能不以思想政治为主了。这也就是韩愈所提倡的“道统”。唐代古文运动的两员主将韩愈和柳

5) 见于《文心雕龙注》，第22页。

6) 颜之推著，程小铭译注，《颜氏家训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第148页。

7) 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祥唐标校，《古文辞类纂·序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页。

8) 参见《汉魏六朝论文主题的历史演进》，《安徽师大学报》，1994，第3期。

宗元，都写了大量的语言形式不拘一格，气盛而雄辩的政论文。在他们之前的六朝和唐初，论说文与其他各种文章一样，也染上了骈偶的习气且愈演愈烈。因他们杰出的写作实践，才打破了骈偶对加之于论说文的枷锁，使之能随意挥斥抒发，从而推动了论说文的巨大进步。⁹⁾ 由此我们可得知古文运动的特点及它和文体改革之间的关系，扩大而之，便可得知古文运动和讽谕文之间的关系。可以说道统论这个古文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具有积极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意义。孙昌武先生认为韩愈的文以明道是在给散文注入一定的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引导散文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而不只是让文学去表现古老的、僵化的教条。基于这一点，为体现古文运动的精神，当时政论文章大量出现了。随之，采用讽谕手法的政论性文章也多起来了。因为，讽谕主要是作家对政治社会等现实问题表明自己见解的手法。特别古代封建社会里要批判统治阶级的弊病和社会矛盾时，讽谕比直说更方便更有效。这也是当时出现很多讽谕文的主要原因。然而，到了唐宋时期，论说文的一切体式都以齐备，论、辩、议、说、解、原等。这就意味着每个体式都具备自己独特的特点而和其他体式能加以区别。那么论体有什么样的特点来与其他类区别的呢？那就是“研精一理”和“从正面阐述事理，表明己见”。即其基本写法是根据一个论点，做周详的推理论证。重在见解景深，逻辑严密。因此，论不能再采用讽谕的手法。下面是唐代论体讽谕文刘禹锡的〈因论〉的序文。

刘子闲居，作〈因论〉。或问其旨曷归欤？对曰：“因之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无形，垂训于至当，其立言之徒，放词乎无方，措旨于至适，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匪立匪寓，以因为目。〈因论〉之旨也云尔。”¹⁰⁾

这是刘禹锡对“因论”这个篇名的解释。我们通过序文可得知刘禹锡怎么了

9) 朱迎平先生认为古文家开拓的文体或主议论，或主记叙，且尤议论占绝对多数。朱迎平，《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第108页。

10) 刘禹锡《刘禹锡集》卷第6（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76页。

解论和寓言。刘禹锡特别提到〈因论〉不是一般的论，也不是寓言。他所提的立言的条件“造端乎无形，垂训于至当”是和刘勰所提的论的条件即“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¹¹⁾非常相似。我们把刘禹锡所说的立言可以看作论。这里的“无形”意味着论主要是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等通过抽象的逻辑来表达作家的见解。现代的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因论〉七篇是一组介于论文和寓言之间的杂文。¹²⁾这也是刘禹锡的观点大体上一致的。如此可见，刘禹锡对论文的理解是很清楚的。其实，刘禹锡擅长写论文，并且颇为自信。他在〈祭韩吏部文〉中曾经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¹³⁾那么看一下〈因论〉之中的一篇〈傲舟〉。

刘子浮于汴，涉淮而东，亦既释舟解纜，榜人告余曰：“方今湍悍而舟鹽，宜謹其具以虞焉。”予闻言若厉。繇是褫以室之，灰以墻之，輒以乾之，仆息而躬行，夕惕而昼勤，景霾晶而莫进，风异响而遽止，兢兢然累辰，是用获济。偃檣卸棹，次于淮阴。于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游肆而觴矣，或拊桥而歌矣，隶也休役以高寝矣。吾曹无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寐，潜澍，涣然阴溃，至乎淹簧濡荐，方卒愕传呼，跳跳登墟，仅以身脱。目未及瞬而楼倾轴垫，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

刘子缺然自视而言曰：向予兢惕也，汨洪连而无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沉而致危。畏之途果无常所哉！不生于所畏而生于所易也。是以越子膝行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至于覆国夷族，可不儆哉！呜呼！祸福之胚胎也，其动甚微。倚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困而后儆，斯弗及已。¹⁴⁾

这是一篇寓言式杂文，也可以说典型的讽谕文。从题材的浅近，记人记事的内容及寓意深刻的方面来看，这篇文章和前节所提的人事杂记体讽谕文很相似。不同的是其内容是作家亲身的经历，但作家不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表述。也

11)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同上，第328页。

12) 参见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21页。贝远辰选注《历代杂文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101页。郭豫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2页等。

13) 刘禹锡《刘禹锡集》卷第40，同上，第605页。

14) 刘禹锡《刘禹锡集》卷第6，同上，第80-81页。

就是说，作家为能够体现出自己的观点，按照主观的逻辑重新设立了框架，并通过历史事实来加以证明。也许这就是作家把它不能以“记”或“志”来提名的主要原因。

除了刘禹锡的〈因论〉7篇以外，以论提名的唐代讽谕文还有谢偃的〈愚夫哲妇论〉，元结的〈臆论〉，〈化虎论〉，〈丐论〉等。这些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和〈儆舟〉差不多。而这些作品都是古文运动兴起以前的作品。刘禹锡虽然是与韩愈、柳宗元一起领导古文运动的中唐时期的主要古文家之一，可是他在〈因论〉的序文上特别提到〈因论〉不是一般的论，再加上每篇作品都有具体杂题（〈鉴药〉，〈讯耻〉，〈叹牛〉，〈儆舟〉，〈原力〉，〈说骥〉，〈述病〉等）因此，〈因论〉这篇文章不能算是真正的论文。古文运动以后以论提名的讽谕文极少。比如，柳宗元是唐代创作讽谕文最多的作家。不过他的文章之中几乎一篇论体讽谕文也没有。古文运动以后，随着散文体式的完备，论说文分为论、辩、说、议、原、解（释）等体式，其中论的体式已经被确定为“从正面阐述事，表明已见解。”所以，论再也不容易采用讽谕的手法了。

2. 说体讽谕文

论和说都是通过作家的观点和见解来明辨是非，说明事理的文章。可以说它们的性质是很相近的。因此一般把它们合称为论说。不过，论和说不但在其源流和演变过程方面截然不同，而且它们的文体还各有其不同的特色。论的起源在于先秦诸子百家的论辩文，而说是从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说辞。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对说有如下解释：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译；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彰于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踊；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振而封……凡说之要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

自非譎敌, 则唯忠与信. 披肝胆以献主, 飞文敏以济辞; 此说之本也.¹⁵⁾

刘勰对说的解释反映出说的起源在于游说之辞. 那些策士们都该打动人心让对方接受自己的主张. 众所周知, 他们的言辞非常灵活, 一般多采用比喻, 重视文词. 因此, 陆机在《文赋》说“说辩华而譎狂”¹⁶⁾ 对此, 李善解释说“说以感动为先, 故辩华譎狂” 这就间接地反映说的渊源和本质特点. 可是, 秦国统一天下之后, 这种策士们的游说之辞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基本上绝迹了. 因此, 汉魏晋时期写作说体文章的作家极少. 《文选》也没有设立说体. 所以, 徐师曾在《文体明辨·说》说“魏晋以来, 作家绝少, 独曹植集中有二首, 而《文选》不载.”¹⁷⁾ 然而魏晋时期的说体文章虽然其数量极少而还没有能够设立一种文体的力量可是它具有较大的意义. 魏晋以前的说只不过是史书或诸子百家书上记录的游说家的言辞而已, 并不是成篇的文章. 可是到了魏晋终于出现了独立成篇的说体作品. 比如, 曹植有《说疫气》, 《籍田说》, 《画说》, 《鹤鬪说》, 梁吴均有《饼说》, 徐爱的《旌头说》等. 这些文章都给后代的说体作家很大的启发作用, 由这一点来说给魏晋时期的单篇说体文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反正魏晋时期文人的心目中说并不是一种正式文体. 可是到了唐代说体文章非常兴盛而达到了新的发展和创断. 吴讷在《文体明辨·叙说》说:

至昌黎韩子, 悯斯文之日弊, 作《师说》, 抗颜为学者师. 迨柳子厚及宋室诸大老出, 因各即事即理而为之说, 以晓当世, 以开悟后学, 由是六朝陋习, 一洗而无余矣.¹⁸⁾

唐宋以后的说体文一般偏重于说明性, 解说性. 吴讷所提到的韩愈的《师说》就可以说一篇说明文. 不过, 它和论或其他的论说类文章比起来, 文章里有

15) 刘勰著,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 同上, 第328-329页.

16) 国立编译馆主编,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资料汇编》, (台北: 成文出版社, 中华民国67), 第188页.

17) 徐师曾著, 罗根泽校点, 《文体明辨序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第132页.

18) 吴讷著, 于北山校点, 《文章辨体序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第43页.

种种修辞手段，文学性极富的文字。又有的时候，文人把自己的见解或者主张说明的时候采用讽谕的手法。因为借用故事或者相似的例子来说明的话，有时其效果比直接加以说明的文章更好。后来把这种说体文一般称谓杂说。钱穆先生在对此如下说：

杂记之外，复有杂说。于韩集亦不多见，而柳集乃颇盛。所谓说者《汉志》九流十家有小说家者流。其书虽不传，然诸子之书尚多有之。尤以庄子书为然，亦可为庄周寓言，皆小说也……又如策士纵横游说，见于《战国策》者。其文亦多以小说杂糅之。惟此等皆熔入长篇，不独立为文，因此后世遂不见此体……柳集有《鹤说》，有《捕蛇者说》，有《谪龙说》，有《黑说》，有《观八骏图说》，皆杂说之体也。¹⁹⁾

吴曾祺在《文体刍言》如下提到：

说之始兴，盖出于子家之余绪，殷自汉以来，著述家所作杂说，出于寓言者，十尝八九。盖皆有志之士，闵时疾俗及伤己之不遇，不欲正言，而托物以寄意，此其义也。后人推波助澜，用演之为小说部，俨然于文中别出窠臼矣。²⁰⁾

从钱穆和吴曾祺的见解中，我们可知杂说和寓言，游说之辞，之间有密接关系。他们主张杂说的起源是寓言或游说之辞，而杂说和它们一样具有小说的特点。陆机在《文赋》说“说诤华而譎狂”那是因为游说的目的在于说服，感动对方而让对方采纳自己的主张。因此，游说之辞象小说那样结构奇妙，修辞丰富，内容不难而较有趣。诸子之书里的寓言也是诸子们展开自己的哲学的，政治的主张时常用的说法。其特点也是游说之辞差不多。那么唐代的杂说为什么具有游说或寓言的特点呢？首先看下一篇杂说。下面是柳宗元的《黑说》。

19)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第50-51页。

20) 见于颜瑞芳，《中唐三家寓言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第137页。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黑。黑之状，被发人立，绝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猎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昔云持弓矢罾火，而即之山，为鹿鸣以感其类。伺其至，发火而射之。羆闻其鹿也，趋而至。其人恐，因为虎而骇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则又为黑。虚亦亡去。黑闻而求其类，至则人也，卒碎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黑之食也。²¹⁾

<黑说>全部内容几乎都是有趣的故事。而这是篇含有深刻寓意的典型的寓言。很可能是作家批评唐朝的以藩制藩的政策。虽然内容很简单，不过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没有直接的说明就能够表达出该善内而不恃外的道理。唐代的大多数杂说是象<黑说>那样讽刺政治社会矛盾的讽谕文。钱穆先生提到的寓言就是讽谕文的一种。大多数游说之辞也是一般多采用比喻来主张自己见解的讽谕性的文章。寓言，游说之辞，杂说都对现实的种种问题表达出作家的观点和见解。这三者都为达到这个目的，主要采用比喻的手法。就是说，这三者的写作目的很相似，随之它们的手法也差不多。而他们的写作目的和手法，即主要借用故事或比喻的事例等形象的方法来间接地指点现实问题就是讽谕的概念。论者们把寓言，游说之辞，杂说借用的比喻或故事等形象的手法认为小说的特点。

而讽谕文是通常在国家社会混乱时，要传达讽刺教导意味而写作的文章。战国时代和安史之乱后的唐朝都是乱世。杂说和战国时期的寓言以及游说之辞都是为克服混乱政局的乱世之文。如此，寓言，游说之辞和杂说在其产生，写作目的和表现手法等各方面有着密接的关系。

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以通过文艺创作来改善混乱政局为目的的。这就是唐代讽谕文兴起的主要原因。唐以前，说数量极少且又不是正式文体之一。可到了唐代，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因古文家的需要说变得极为盛行，而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重要文体中的一个。《文苑英华·杂文》里，说收录三十余篇。姚铉在《唐文粹·古文》之中把说设立为一种文体。那里有24篇的说。在这两本书收录的说大多数是中唐以后的作品。这就意味着说是古文家所创造的新的文体。唐

21) 柳宗元，《柳宗元全集》卷16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42页。

代的主要杂说有柳宗元的〈观八骏图说〉, 〈谪龙说〉, 〈鹤说〉, 李翱的〈国马说〉, 黄颇的〈受命于天说〉, 陈黯的〈御暴说〉, 〈本猫说〉, 来鹄的〈俭不至说〉, 〈猫虎说〉, 杨夔的〈原晋乱说〉, 〈植兰说〉, 〈蓄狸说〉, 罗隐的〈说天鸡〉, 陆龟蒙的〈说凤尾诺〉, 〈杂说〉等很多. 这些作品都是以生活周围的小物作为主要题材, 且都具有讽刺教导意义的讽谕文. 比如, 〈鹤说〉通过鹤与鼠, 梟的习性比较讽刺朝廷里反阳刚低贱的风气. 〈说天鸡〉是通过狙氏子在养鸡上的失误和痴呆木然的鸡来指责尸位素餐的高官和不用真才的任用制度. 如此, 中唐以后兴起的杂说大多数是以社会政治上的教化为目的的讽谕文. 当时杂说里面, 寓言, 寓言式杂文或者杂文等讽谕文的所有类型都有. 比如, 〈黑说〉是典型的寓言, 韩愈的〈马说〉是杂文. 李翱的〈国马说〉是寓言式杂文. 这就意味着杂说的写法非常灵活多样. 可能因此这种文章叫做杂说. 杂说只要能够体现作家的讽刺教导的意图, 而同时不被形式束缚. 这就是古文运动家要文体改革的最主要的目的. 因此, 杂说的内容和形式都和古文运动的精神很符合.

在这里, 我们要注意到唐代的说有两种. 一种是采用讽谕的杂说. 还有一种象韩愈的〈师说〉类的说明文. 林纾把杂说看作说的别的一种. 他说“学人训释雅, 亦皆有说, 皆主发明至理而言, 名曰经说. 近人阐明学理, 亦曰学说. 独昌黎之〈马说〉, 子厚之〈捕蛇者说〉, 则出以寓言, 此说之变体也.”²²⁾ 他提到的“发明至理而言”或“阐明学理”是一般说明文的特点而〈马说〉, 〈捕蛇者说〉是和一般的说明文截然不同的讽谕文. 林纾把杂说当作说的变体. 即他认为杂说并不是说的主流. 后代的学者都认为说的主流是说明文. 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上说:“按字书:‘说, 解也, 述也, 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于说卦, 汉许慎作《说文》, 亦祖其名以命篇.”²³⁾ 徐师曾对说体的阐释也着重着说明的意味. 褚斌杰先生认为古文中的“说”是指说明文. 说着重于说明, 伸释.²⁴⁾ 可是唐代杂说非常盛行. 《唐文粹·古文》和《文苑英华·杂文》里也

22) 林纾著, 舒芜校点, 《春觉斋论文》(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第61页.

23) 徐师曾著, 罗根泽校点, 《文体明辨序说》, 同上, 第132页.

24) 谢楚发先生也认为说体文是说明事理的文章, 与论体文接近, 论辩文的一切特征说体文都具有, 解释性, 说明性的语言较多, 他又特意对杂说提到过. 他认为〈马说〉,

有杂说，也有说明文。而杂说的数量并不比说明文的少。即到了唐代，说成为独立文体而进一步分化为说明文和杂说。

如上所提，“从正面阐述事，表明己见解。”的论不好采用讽谕，故唐代论体讽谕文不多。古文运动兴起之后散文文体系统地完备，随之论体讽谕文也不再多见。可是论说和讽谕文之间有相同之处，所以没有把讽谕文看作一种文体的唐代文人借用说的体式来写作讽谕文。在如此的过程当中唐代的说体文分为了说明文和杂说。后代的文人也不断地创作讽谕性杂说。

III. 结 论

唐代安史之乱之后，政局极为混乱，文人要用文艺来解决政治社会上的种种问题，然而袭用旧套的文章不能自由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见解，于是，文人们兴起了古文运动，即追求散文的自由形式和内容，从而发生了文体的改革。要解决政治社会上的种种问题的文人的努力，当时大量出现了以政治或社会等现实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论说文章，而在批判现实的问题表达出自己见解时采用讽谕手法是非常有效的，因此文人们往往借用讽谕文来写作论说体式，在这个过程中论说体式产生了很多变化。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和他们的追随者们提倡文体文风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就。随着散文体式的完备论说文被划分为论、辩、议、说、解、原等体式。这就意味着每个体式都可以被归为论说类，然而各体式具备自己固有的特点，故可以和其他体式加以区别。唐代的论说体讽谕文即借用论说体式来写的讽谕文，主要是说体讽谕文和论体讽谕文。但古文运动以后经过论说文体的改进，变成了说体讽谕文为主的体式。因为文体改革以前论说类文体有论和说两种，当时论体讽谕文和说体讽谕文是并存的。后来经过文体改进，论体文的性质确定为“从正面阐述事理，表明己见”，从而论体再也无法使用具有间接而比喻性质的讽谕手法，所以中唐以后的文人往往采用起源于游说之辞

〈捕蛇者说〉等以说命名的杂说是一种托物寓意之文。杂说不该属于说体文该属于讽谕文。谢楚发，同上，第118页。

的说的体式来写作讽谕文，因为游说之辞和讽谕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古文运动以后频繁出现了文人们借用说的体式来写作讽谕文的情况。但是说体文中还有以直接说明和解说为主的说明文，说明文以外的说体文章一般被称为杂说，而唐以后杂说的主流是讽谕文。

总之，唐代文人因不把讽谕文看作正式文体之一，用与讽谕文有相通之处的论说文体创作讽谕文。然而因讽谕文有自己固有的特点，如果借一般的论说文体来写作讽谕文，那么，论说文体的内容以及形式必须加以改变。于是在这个过程中便出现了变形的论体文章和杂说。

<参考文献>

- 《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
《唐文粹》《印景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 民国七十二。
《刘禹锡集》，中华书局，2000。
《刘禹锡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郭豫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刘协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
林纾著，舒芜校点，《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吴纳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朱迎平著，《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文史哲出版社，1995。
颜之推著，程小铭译注，《颜氏家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 谢楚发, 《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版
 钱穆,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 东大图书公司, 1991.
 贝远辰选注, 《历代杂文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
 褚斌杰,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陆机著, 张少康集解, 《文赋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孙昌武, 《唐代古文运动通论》,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资料汇编》, 成文出版社, 中华民国六67.
 彭玉平, <汉魏六朝论文主题的历史演进>, 《安徽师范大学报》第22卷, 1994.
 李珠海, <浅论中国古代散文中的说体>, 《中国语文学论集》第19号, 2002.
 南哲镇, <由“讽”和“谕”的字意看“讽谕”的意味>, 《修辞学习》第2期, 2004.
 南哲镇, <唐代杂说考察>, 《中国语文学论集》第30号, 2005.

<국문초록>

安史의 亂 이후, 政局이 혼란에 빠지자 文人들은 文藝를 통해 政治的, 社會的 문제점들을 해결하려고 했는데 과거의 구습과 형식적 속박에 얽매인 文章으로는 자신들의 사상과 견해를 적극 피력할 수 없었기에 古文運動을 일으켜 散文의 자유로운 형식과 내용을 추구하게 되었고 그 결과 文體의 改革이 이루어지게 된다. 그리고 이러한 고문운동의 지향점으로 인해 당시 정치나 사회 등 現實問題를 다루는 論說類 문장이 특히 많이 출현했는데, 현실문제를 비판·지적하고 자신의 관점과 견해를 피력하는데는 諷諭法이 매우 유용하게 활용될 수 있으므로 論說 文體에 諷諭法을 도입하는 경우가 많아졌고 이 과정에서 기존 論說 文體에 많은 변화가 일어나게 된다.

그런데 唐代는 古文運動과 文體改革의 영향으로 많은 散文 文體가 체계화되고 整備되게 된다. 그에 따라 論說類 문장도 論, 說, 辯, 解, 釋, 原, 評 등으로 세분화 되었는데 이는 이들을 모두 論說類로 통칭할 수는 있으나

하위 諸문체들은 이제 제각기 자신들의 독특한 특징을 구비함으로써 상호 구분되게 되었음을 의미한다. 唐代 以前の 論說體 諷諭文 즉 論說 文體를 빌어 창작한 諷諭文은 거의가 論體와 說體에 집중되어 있는데 古文運動 이후, 論說 文體들이 정비되고 나면 論說體 諷諭文은 說體 諷諭文 위주가 된다. 왜냐하면 문체개혁 이전의 論說類 문체는 論과 說 둘 뿐이었고 그 당시에는 論體 諷諭文과 說體 諷諭文이 공존했었다. 그런데 文體의 改革 및 整備로 論의 성질이, 作家가 正面에서 엄밀한 論理와 抽象的인 概念으로 자신의 관점과 견해를 펼치는 것으로 확립되자 이제 論은 더 이상 迂廻的이고 比喩的인 諷諭法을 채용하기가 힘들어졌다. 이에 文人들은 遊說之辭에 起源을 두고 있는 說로써 諷諭文을 창작한다. 왜냐하면 遊說之辭와 諷諭는 여러 가지 면에서 상합하는 점이 많았기 때문이다. 그래서 古文運動 이후 文人들은 說體를 빌어 諷諭文을 창작하는 경우가 빈번해졌다. 그런데 說에는 解說과 說明을 위주로 하는 正格의 說明文도 있다. 說明文 이외의 說體 文章을 보통 雜說이라고 하는데 唐 이후 古代의 雜說에는 諷諭文이 특히 많다.

정리하면, 諷諭文에 대한 文體的 認識이 없던 唐人들은 성격상 諷諭文과 상통하는 점이 있는 論說 文體를 빌어 많은 諷諭文을 창작했다. 그렇지만 諷諭文은 諷諭文 나름대로의 독특한 특징이 있으므로 論說 文體로 풍유문을 창작하게 되면 論說 文體의 내용과 형식이 변화될 수 밖에 없다. 이런 과정에서 雜說이라는 신종 문체가 대두되었고 또한 변형된 論體 文章도 많이 등장한 것이다.

주제어: 古文运动, 文体改革, 论说文体, 讽谕, 论体讽谕文, 说体讽谕文, 游说之辞, 杂说